

东靖民间谍案考析^{*}

陈景彦 徐 磊

近代日本为了推行对外扩张战略，不断向中国派出军事间谍，刺探清政府方面的情报。日本派出的军事间谍多数都取得了成功，其所获取的大量情报，为日后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依据。但也有日本派出的军事间谍不慎失手被清政府抓获的例子，光绪十年（1884）发生的东靖民案即为其中的代表。在目前已刊的史料中未见关于东靖民案的详细记载，国内外学界也未见关于东靖民案的专题研究。^①最近笔者在整理中日两国的外交档案时，发现了有关东靖民案的记载。^②本文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详细地考察整个案件的始末。

一、日本的间谍活动与姚文栋的情报

要全面地考证、分析东靖民案，首先要从姚文栋获取日本间谍潜入中国内地的情报谈起。

姚文栋，字子梁（志梁），上海人，光绪八年随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出使日本，为驻扎东京使署随员。根据姚文栋之子姚明燿所编《景宪府君年谱》的记载，“府君在东京使馆，因奉钦使委派，应接文士，故交游日本、朝鲜人士甚广”。^③由此可知，姚文栋在驻日公使馆的主要任务就是应酬接待日本、朝鲜人士，但姚文栋到底结交了哪些人，参加了哪些活动，这在姚文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地域文化研究”（10ZD&071）子课题“东北亚区域文化的交融与比较”的研究成果。

① 戚其章先生在《甲午日谍秘史》一书中曾提到过东靖民间谍案，但只简单介绍了东靖民在宁古塔被拿获，后转送上海被释放的经过。详见戚其章：《甲午日谍秘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② 日本方面的档案是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所公开的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外务省记录，档案的标题为《在牛莊帝国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査一件》。该档案共有280页内容，主要为关于东靖民案中两国之间的往返照会、公函以及日本驻华使领馆与外务省之间的往返电报、公函等，所有文件皆为手写的原件。因内容过多，故整个档案依时间顺序，被分成三个部分，每部分都有单独的查询代码（Ref）。一、明治17年5月20日—明治17年6月25日，共114页，Ref：B07090484100；二、明治17年7月1日—明治17年8月25日，共89页，Ref：B07090484200；三、明治17年8月29日—明治18年9月5日，共77页，Ref：B07090484300。为方便阅读和引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还对整个档案统一编排了页码。中国方面的档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的总理衙门档案，档案的标题为《咨报日本东靖民一案已照该国例断罚赵二已递解回籍由》，该档案共7页，为两江总督曾国荃致总理衙门汇报东靖民案处理情况的公函。

③ 姚明燿：《景宪府君年谱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的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而根据日本方面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姚文栋曾于1882年4月加入了兴亚会。^①兴亚会于1880年3月9日正式成立,创立之初,由长冈护美任会长,渡边洪基任副会长,以“中日提携”和“兴亚”为协会的活动目标。^②加入兴亚会的人员多与中国有关联,其中不乏外务省系统、军队系统的人员,有一部分人就是从事对华情报工作的,有学者统计:“兴亚会曾囊括40余名情报人员为会员”,^③在这些情报人员之中,比较著名的如曾担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长期在中国侦察的海军军官曾根俊虎等。与如此众多的日本情报人员在同一个团体内,这为姚文栋了解日本对华谍报活动提供了条件。姚文栋通过自己的社交活动,逐步了解了日本向中国派遣间谍的情况。在朝鲜的“壬午兵变”发生后,他得知日本派遣间谍秘密潜入中国内地,立刻将这一情况以密信的形式汇报给驻日公使黎庶昌。黎将姚文栋的密信随自己的公函一起寄给总理衙门。

闻日本所遣探子曾根俊虎、町田实一、清水元一郎、东次郎四名,系由朝鲜潜往吉林,窥探吴京卿营中虚实。此系一日人所述,自云知之甚确。日本自明治以来,遣人潜游中国内地,已非一次。前四人亦已屡充此役。就中曾根略有文名,曾著《清国探视志略》、《北清纪行志略》、《清国近世乱志》各书,皆其为探子时笔墨。闻此辈到华后,即改装中国服色,恃其痛通华语,易于弊混,并不携带护照,只雇用一二中国人同行。并闻其在山东、福建内地时,有勾结莠民怂恿起乱等事。彼国人传闻藉藉,恐非无因。又据闻,探视之人所给俸薪优于寻常数等,归后又有升擢,故此风渐开渐盛,国中公然有探子名目,为热中者所艳称。此次自著名四人外,更有未知名之数人,不知遣往中国何方云云。随员窃思,改装潜行,非两国和约所许,况闻有勾煽等情,尤可恶。拟请大人函告总理衙门,密令近海省份及吉林等处,暗地察访,如于通商不及之地遇有假装潜游不带护照之外国人,即予就地正法,则将来可以绝此弊风。否则禁网阔疏,亦外国轻视中国之一端也。是否有当,伏祈核夺。随员文栋谨禀。^④

在这份简短的密信中,姚文栋从两个层面密报了日本对华谍报活动。首先,姚文栋汇报了日本对华派遣间谍的情况。姚文栋从一个日本人那里得知日本派遣曾根俊虎等四人前往吉林地区窥探虚实,他还得知,除了曾根俊虎等四人以外,另有不知姓名的数人不知被派往何处,此前日本已经多次向中国派遣间谍。其次,姚文栋指出了日本间谍的危害,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可以说,姚文栋的这份情报掀开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总理衙门于光绪八年八月十七日(1882年9月28日)^⑤收到黎庶昌的公函。随后,总理衙门致函各地的督抚大员,命令查拿日本间谍。管辖东部沿海要地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于11月4日接到总理衙门“以日本私遣探子曾根俊虎等潜赴吉林及沿海等省地方探听虚实,饬即查拿”的来函后,复函表示要“密饬所属文武各员一体遵照,不动声色,严密查访”。^⑥而地处西陲的四

① 黒木彬文、鱒沢彰夫解説:《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會報告》第1冊,東京:不二出版,1993年,第228頁。

② 有关兴亚会成立时间、性质、人员构成等,详见戚其章:《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④ 《照录姚随员节略》(光绪八年八月十七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945—946页。

⑤ 以下所涉事件日期一律以公历年月日进行表述。

⑥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刘泱泱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704页。

川总督丁宝桢也于12月19日收到总理衙门抄送姚文栋提供的情报及“谕令密飭文武员弁随时盘诘”的来函，丁宝桢复函表示要“严飭各属于各国游历暨传教人等随时留心稽查，如有改装中国服色形迹可疑而又无护照者，即予扣留”。^①虽然现存史料中找不到吉林方面的反应，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姚文栋情报中“日本探子”的侦察重地，吉林应是重点查拿“日本探子”的地区。虽然在接下去的一年里并没抓获“日本探子”的消息，但是到了1884年，在吉林的宁古塔发生了东靖民案，这也引起清政府方面对姚文栋情报的关注。下文依据日本外务省记录和清总理衙门档案，对东靖民案的始末进行详细考证。

二、东靖民案始末

1. 申请游历的交涉

1884年1月21日，日本驻营口代理领事官班迪诺^②致函奉锦山海关道续昌，称有日本国士族东靖民定于1月30日由营口起程，前往奉天的海城县、牛庄、辽阳州、铁岭县、开原县以及吉林的船厂、拉林、伯都讷、宽城子、宁古塔等处和黑龙江的巴彦苏苏游历，因该士族“性情和蔼，人品端方”，所以请求照章发给护照。^③1月22日续昌函复班迪诺，以“吉林、黑龙江地方，现闻马贼充斥，颇不安静”为由，不同意前往吉林的船厂、宁古塔等九处地方，至于奉天省内所属各处，则同意前往游历。^④23日班迪诺又致函续昌，以吉林的船厂、拉林、伯都讷、宽城子时有商货车辆往来，且“路途亦不甚远”，而宁古塔一处，据该士族禀称，“实愿前往，以广见闻”，请求将这些地方一并填入护照内。24日续昌再次函复班迪诺，同意将船厂、拉林、伯都讷、宽城子填入护照，但宁古塔一处“实难照准”，“缘本道既明知其不可，岂可听其前往，转失保护之义务”。25日班迪诺复函表示，“当将各节详细告知该士族”，并希望将游历期限定为6个月。26日续昌致函表示同意将游历期限定为6个月。^⑤

这样，经过班迪诺和续昌的反复书信商议，同意发给东靖民护照，前往奉天、吉林部分地区游历。但续昌始终没有同意将宁古塔填入护照内。而不久之后，东靖民恰恰就是在宁古塔被副都统容山所拿获。

2. 在宁古塔被捕和受审的经过

关于在宁古塔被捕和受审的经过，在解送回营口后，东靖民曾以书面形式详加说明，而宁古塔副都统容山在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声明中也有详细叙述，但两者在某些细节上有较大差距，这也是后来中日双方争论的焦点。

1884年3月29日，已经剃发改装的东靖民随带跟役赵二、车夫邓学先二人，乘坐小车来到宁古塔，随即住宿在西关杨富有的客栈中。31日起程向东行，当行至穆棱河时见到有告示声明，

① 《总署收四川总督丁宝桢函》（光绪九年二月初五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125页。

② 英国人班迪诺（J. J. Frederick Bandinel）于1882年9月至1897年6月长期代理日本驻营口（牛庄）领事官。详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3页。

③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一），明治17年5月20日—明治17年6月2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Ref: B07090484100，第31—32页。

④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一），第33页。

⑤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一），第35—39页。

要前往俄界谋生必须要请领执照。见到这个告示后,东靖民等人就返回宁古塔杨富有的客栈中。4月8日托店主杨富有作保,假称是上海人,名叫董永成,前往俄界找人,从而领取了执照。于9日起程前往俄界,25日到达海参崴,在海参崴停留5日后,30日起程返回。5月12日抵达宁古塔,仍住在杨富有的店里。^①

这天,巡街官兵见东靖民乘小车由东进城,觉得很可疑,故到他住的店中去询问。巡街的官兵仔细查看他的相貌,觉得非常可疑,就把他带回衙门,并禀明宁古塔副都统容山。容山对东靖民进行了审问,但东靖民仍然坚称是上海人,名叫董永成,并不允许查看他携带的木箱,也不允许检查他穿的衣服,“任意狡展,肆行咆哮”。容山考虑“既称是中国人,又穿中国衣服,不应如此无礼”,于是按大清律例命令“掌责六下”。随后发现东靖民的发辫是假的,并从身上搜出护照一张。东靖民这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年29岁,于当年正月带领跟役、车夫领照前往各处游历。容山问道,既然领照游历,为何又要剃发改装。东靖民回答道,因为行路住店经常被众人围观,非常不便,所以才剃发改装。中国官兵又要出钥匙,对东靖民随身携带的木箱进行检查。木箱内有书籍数本及该国衣服等物,还有大小两杆洋枪。^②

5月13日,容山命人将东靖民带到副都统衙门,进行讯问。容山发现东靖民通晓汉字字意,就给他纸笔,让他交代来华及游历的经过。东靖民自写光绪八年九月到北京,九年二月十六日到营口,十年正月初六由营口起程游历,二月十六日到吉林二道岭子……四月初一日到海参崴去见日本国人。考虑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持照游历,所经过的地方都要报明地方官,而且“穿戴衣帽皆系各国服色”,剃发改装之人实为可疑。又询问他是否认识曾根俊虎、町田实一、清水元一郎、东次郎。东靖民回答说,不认识曾根俊虎、清水元一郎,但认识町田实一,并指出町田实一去年五月间回国,九月间到香港当书记生。后东靖民又自己供认东次郎是其姓名,靖民是号。^③随后中国官兵再次打开东靖民的木箱,对里面的物品进行仔细检查,发现书籍中有记载中国城池、公所、官兵数目以及地名、里数、山川形势等的“纪行志略”,检查完毕后,将“纪行志略”以外其余物品仍锁箱内,由查街处官兵暂行保管,钥匙仍交还东靖民本人。然后将东靖民安置在查街处南间办公屋内,并派令官兵照料。^④

5月14日,东靖民等人被带到堂上进行讯问。先审问跟役赵二、车夫邓学先是如何跟随东靖民游历的。录完口供之后,又对东靖民进行审问,但东靖民无论如何都不承认东次郎是其姓名,反复狡辩。无奈仍交查街处官兵领回照看。15日又继续对东靖民进行讯问。东靖民仍不承认东次郎是其姓名。后中国官兵告知有其本人所写“名次郎,号靖民”为证,并将供词给东靖民看过,东靖民终于在供词上画押。^⑤审讯完毕后,容山命云骑尉德凌阿于17日起程,将东靖

① 《在牛莊帝国陸軍將校東靖明清国内地踏查一件》(三),明治17年8月29日—明治18年9月5日,亜洲歴史資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Ref: B07090484300,第225頁。

② 《在牛莊帝国陸軍將校東靖明清国内地踏查一件》(三),第225—226頁。

③ 后来东靖民被解送回营口的领事馆,曾递交了一纸说明,叙述了在宁古塔被提审及“受凌辱”的情形。根据东靖民自己所述,“那一日,将一张写有曾根俊虎、町田实一、清水元一郎、东次郎的纸拿出,问靖民,是否认得此数人。靖民回答认得町田实一……其余三人不认得。该副都统将靖民错认成东次郎,对靖民说‘次郎是汝之名,靖民是汝之号,我早已知之’。……后让靖民写‘名次郎号靖民’,并告知若写可释放靖民,如若不然,将处以斩首。……后就按其所说写了”。参见《在牛莊帝国陸軍將校東靖明清国内地踏查一件》(一),第63—64頁。

④ 《在牛莊帝国陸軍將校東靖明清国内地踏查一件》(三),第226—227頁。

⑤ 根据东靖民自己所述,第四天是在除去了“东次郎即靖民”的字样之后,他才画押的。参见《在牛莊

民等人及搜出的“纪行志略”等物一并解送吉林将军衙门。

到达吉林后，吉林将军希元见是日本人，不便处理，又将东靖民等人及“纪行志略”等物一并解送回发给其游历护照的奉锦山海关道衙门，同时致函盛京将军庆裕说明详情。庆裕收到信后，一面命奉锦山海关道续昌会同日本代理领事官按照条约进行审理；一面将此事上报总理衙门。

3. 由营口经天津解送上海

6月12日东靖民等人被解送到奉锦山海关道衙门。已经听到消息的日本驻营口代理领事官班迪诺当天就致函奉锦山海关道续昌要求将东靖民立刻送归领事馆。续昌称待照会撰好后，连人一并送去，现暂时留署存住。^①在对东靖民进行简单审理并录完口供后，13日，续昌将东靖民送至领事馆并照会班迪诺，详细地叙述了东靖民剃发改装，擅自前往护照中未准许的宁古塔等处，并冒名领照越界前往海参崴，后在宁古塔被捕和受审的经过，告知拟定于15日下午3点在海关公所对东靖民一案进行会审。^②当天班迪诺照复续昌，称东靖民是日本国人，“应由领事官酌定何日何时在何处审讯，中国官员只能观审”。后班迪诺又致函续昌，索还东靖民的四本“纪行志略”。^③14日，续昌函复班迪诺，称东靖民的“纪行志略”，“系吉林将军公文附来，将来应否给还，应俟结案后声请大宪核示遵办，此刻未便遽行送还”。^④18日，续昌再次照会班迪诺，称“查日本条约，凡遇交涉案件，有会同公平讯断之条，并无观审之约，且此案违犯者不特日本人东靖民一人，尚有现在本道押候之中国人赵二、车夫邓学先，均应同堂质讯”，再次要求对东靖民等一千人犯进行会审，而会审的时间和地点则由对方来指定。^⑤

在续昌和班迪诺就会审东靖民的问题进行交涉的同时，6月15日总理衙门也致函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吉田二郎称收到盛京将军来函，已获知日本人东靖民“更易姓名、剃发改装、潜游各处、私自绘图”等情形，要求对方“转饬代办领事，与山海关道，按照条约会同妥办”。第二天，吉田二郎复函称“本署大臣业已备悉一切，兹将所有应办情节，速即札行驻扎牛庄本国代理领事知照”。^⑥

然而，日本方面并没有同意由驻营口代理领事官班迪诺和奉锦山海关道续昌会同审理东靖民案。7月1日班迪诺照会续昌，称日本驻京公使奉外务大臣之命，要求将东靖民案全卷及东靖民一并送归驻天津领事馆核办。^⑦这样，东靖民案的审理和交涉的舞台由营口移至天津。

7月18日津海关道周馥致函日本驻天津领事原敬，称奉北洋大臣李鸿章命令会同查办东靖民案，询问东靖民的起解日期，要求对方“一俟东靖民到津，即行函知到道，会同查办”。21日原敬函复周馥，称奉外务大臣之命，本应由天津领事负责查办东靖民案，但因“现值要公蝟集，且正有赶办事件，难容承办此案”，所以恳请外务大臣将东靖民案转归上海领事查办，“以慎案情”，后得到外务大臣的批准，因此于7月18日将东靖民案全卷及东靖民一并送归上海日本领事

① 帝国陸軍将校東靖民清国内地踏査一件》(一)，第66頁。

① 《在牛莊帝国陸軍将校東靖民清国内地踏査一件》(一)，第40—41頁。

② 《在牛莊帝国陸軍将校東靖民清国内地踏査一件》(一)，第43—48頁。

③ 《在牛莊帝国陸軍将校東靖民清国内地踏査一件》(一)，第50—52頁。

④ 《在牛莊帝国陸軍将校東靖民清国内地踏査一件》(一)，第57頁。

⑤ 《在牛莊帝国陸軍将校東靖民清国内地踏査一件》(一)，第59—60頁。

⑥ 《在牛莊帝国陸軍将校東靖民清国内地踏査一件》(一)，第19—20頁。

⑦ 《在牛莊帝国陸軍将校東靖民清国内地踏査一件》(二)，明治17年7月1日—明治17年8月25日，亚洲歴史資料中心 (<http://www.jacar.go.jp>)，Ref: B07090484200，第151頁。

馆核办。^①日方以“要公蝟集”为由，又将东靖民案的审理和交涉的舞台由天津移至上海。

另一方面，7月23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吉田二郎致函总理衙门，称据天津领事禀报，东靖民已由营口经过天津解往上海，归上海领事审判，而东靖民的四本“纪行志略”以及跟役赵二、车夫邓学先仍留在营口，“此项要证人等，关乎预审裁判，最为至要”，请求总理衙门“转飭上海海道，速即将跟役赵二及纪行志略四本转交代办牛庄领事”。7月26日总理衙门函复吉田二郎，称“跟役赵二等，系中国民人，本应归中国官审讯，惟既系案内要证，应令中国官自行解交上海道收管，并飭上海道会同贵国上海领事讯断，仍各按本国律例惩办。至纪行志略四本，应并交上海道，会同贵国上海领事公同查阅，俟定案后再行核办”。^②

4. 在上海的审理

8月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安藤太郎致函苏松太道邵友濂，简单说明了东靖民案的发生及移案至上海的经过，称待确定了审讯的日期后，“另行函请贵道飭委来堂观审”。^③4日安藤再次致函邵友濂，告知对方“本领事拟于本月初九即礼拜六下午两点钟传该名到案，先行审讯一切，以便定案”，希望对方能派员前来“观审”。^④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对东靖民案展开审讯的当天，邵友濂派租界会审委员黄承乙前往观审。审讯主要围绕着游历的经过和在宁古塔被提审及“受凌辱”的情形展开，安藤所问、东靖民所供的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来华及游历的经过，以及擅自前往护照中未准许的宁古塔等处，并冒名领照越界前往海参崴等的原委。

东靖民供称，来中国是为了游学。先从续道台处领得护照，后由营口起程开始游历。在游历途中偶遇一从宁古塔来的客人，得知其地已经安静，并无马贼滋扰，于是“窃自揣度，宁古塔即属吉林所管之地界，所持护照既载吉林字样而特不载宁古塔地名，盖因谨防马贼之害，现既可保无虞，则径赴该处，料必无妨”，因此便决定前往宁古塔游历。后投宿在宁古塔西关外的杨家店。听住店的客人说起东山海参崴光景，“极称美观”，于是便起了游历之念。但行至穆棱河时见有告示声明，要前往海参崴必须要请领执照。考虑以日本人的身份恐怕很难领到执照，所以假称上海人董永成，托杨家店东作保，从地方官署领得执照，前往海参崴游历。^⑤

其二是在宁古塔被提审及“受凌辱”的情形。

东靖民供称，刚从海参崴回来投宿在杨家店，就有两个查街的官兵来到，谈了几句，便被他们带去衙门。于是拿出护照来给他们看，并解释此次是领照游历各处。后被带到副都统府，副都统又问为何剃头改装，回答为了行路住店方便。检查完行李后才允许回店。第二天提审，被副都统无端逼认为东次郎。到了晚上，被关在监狱一样的屋子里，又被戴上枷锁。第三天又被带到副都统府，因不承认是东次郎，又不肯下跪，所以被用皮鞭打了右脸五下，左脸一下，然后仍被关入监狱。第四天被要求在供词上画押，后在除去了“东次郎即靖民”的字样之后，才画押的。又被关押了两天后，由宁古塔押送至吉林。在押送至吉林的途中仍然被戴上枷锁，出发后的第三天才除去枷锁。^⑥

①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二)，第164—166頁。

②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二)，第183—184頁。

③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二)，第179頁。

④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二)，第180頁。

⑤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二)，第189—191頁。

⑥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二)，第191—195頁。

在安藤不断讯问下，东靖民详细地描述了在宁古塔“受凌辱”的情形。在审讯过程中，东靖民对擅自记录中国城池、公所、官兵数目以及地名、里数、山川形势等事实只字不提，而审讯的安藤也对此避而不问，东靖民的四本“纪行志略”也没有被提及。在审讯记录中，也没有观审的黄承乙提起此事，或提出抗议的记载。

8月19日安藤太郎照会邵友濂，称“兹查该案情，虽系均属确实可据，只以两造悬隔，未便当堂彻底质讯，现在本领事只得一面之词，未便草草断案核办，为特译录东靖民供词，送请贵道查照。仍希将该录供词送致山海关道，经由该道转递吉林将军查阅，即将该东靖民所供各节，赶速行文宁古塔副都统，确凿咨询，逐节明晰质证，赐速示复，以便持平公断”。^①后邵友濂辗转将东靖民的供词抄送宁古塔副都统容山处。容山对东靖民在宁古塔被捕和受审的情形详加陈述，又对东靖民供词中与实际情形不符之处逐一声明。

首先，针对东靖民供词所供被带到衙门后就主动出示了护照，公开了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容山则称东靖民被带到衙门审讯时仍然“以上海人名董永成前来找人等语含混回答，不吐实情”。其次，针对东靖民供词所供被无端逼认为东次郎，容山则称没有对其进行逼供，是其自己所供“名次郎号靖民”。^②

此外，容山还对东靖民供词中许多“受凌辱”的情形，进行了一一驳斥。针对东靖民所供被戴上枷锁关进监狱，容山则称是将其安置在查街处南间办公屋内，并未让其戴枷锁。针对东靖民所供因不肯下跪被用皮鞭打脸六下，容山则称只是东靖民不承认是日本人时才对其“掌责六下”，以后没有对其用刑，也没有强迫其下跪。针对东靖民所供在押送至吉林的途中仍被戴上枷锁，容山则称并未让其戴枷锁，只是给跟役赵二戴锁。^③

由于东靖民的供词和容山的声明差距过大，无法判断当时的实际情形。所以又针对东靖民在宁古塔被提审的情形，对跟役赵二进行了审讯。赵二的证词部分证明了东靖民“受凌辱”的事实。同样，在对赵二的审讯中，也对东靖民擅自记录中国城池、公所、官兵数目以及地名、里数、山川形势等关键事实避而不问。

经过对东靖民和赵二的审讯，又经过安藤太郎向日本外务省汇报审理情况，外务省咨询司法省，最终依照日本法律对东靖民案作出了宣判。1885年7月10日安藤太郎照会邵友濂告知了审判结果。

（前略）该被告东靖民，前在清国营口游学，请由该关道发给护照，于明治十七年二月初二日由营起程，前赴广宁、义州等处游历。途中初为旅次方便，改换清国衣裳。向东北行，经八面城、买卖街等处，旋由宽城子将赴吉林之途，传闻宁古塔地方已经安静，并无马贼滋扰。窃自揣度，所持护照既载吉林字样而特不载宁古塔地名，盖因谨防马贼之害，现既可保无虞，则径赴该处，料必无妨，由此竟往宁古塔，到西关外杨家店投宿。适有同歇行客说及东山海参崴光景，极称美观。该被告闻此忽起游历之念，旋思如系日本人，请领前赴该处路照，恐费周折，似不易得。以故伪称上海人董永成，洩及杨家店东作保，即差仆从赵行真，请由地方官署给照，前赴海参崴游历。一切情事，显系欲遂私意。妄自伪籍假名，藉占便宜之处，实属显然。据此，查该被告犯情，第一改装衣裳；第二越赴护照上未载明准往之地；第三伪籍假名，冒领路照，计此三项。其第一项、第二项，事虽不合，

①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二），第198頁。

②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三），第226—227頁。

③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三），第227—228頁。

只以律无明条，薄示警戒，现置不问。至其第三项，当援左开条例处办。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凡对官署以文书或言语，诈称其属籍、身份、氏名、年龄、职业等者，着罚金二圆以上，二十圆以下云云。按此着被告东靖民罚金壹拾圆。^①

总理衙门于8月27日收到南洋大臣曾国荃的公函，文中转抄了邵友濂对东靖民案审判情况的汇报，“伏查东靖民剃发改装，潜赴中国边界，供情确实。该领事援照日本国例讯断罚办，有无偏倚从轻无从查悉。惟奉飭各按本国律例惩办，似可准其销案”，东靖民的跟役赵二则“拟即递回顺天原籍，交保管束，以示薄惩”。^②

纵观东靖民案整个交涉和审理的过程，清政府方面由主动渐渐转为被动，而日本方面则步步为营，逐渐扭转了东靖民案突然发生带来的被动局面。在审判地点的选择上，由营口移至天津，又由天津移至上海，成功地远离了事发地点和清政府的权力中心。审判的方式由最初续昌照会班迪诺，总理衙门照会吉田二郎的“会同审理”，到实际审判时的“来堂观审”，成功削弱了清政府方面可能对日方审判带来的影响。在审判的内容上，对有实物为证的东靖民擅自记录中国城池、公所、官兵数目以及地名、里数、山川形势等事实避而不审，不断将审判的方向引向是否“受凌辱”的问题上，成功地回避了最为敏感的问题，并确立了此后双方争论的焦点。而最终的审判结果更像是为东靖民剃发改装、越境潜游的间谍行为进行的辩解说明，由此东靖民案也被定性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场“误会”。另一方面，清政府方面会同查办东靖民案的苏松太道邵友濂和前往观审的黄承乙则未能以东靖民的四本“纪行志略”为证据，对日方的间谍行为进行揭露。最终日方成功地以处罚东靖民“罚金壹拾圆”销案了事。而清政府方面也最终错失了以东靖民案为契机，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谍报活动进行揭露的好机会。

三、东靖民真实身份与侦察活动

东靖民案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东靖民的真实身份。在双方的交涉过程中，日本方面始终坚称东靖民是来中国游学的“日本国土族”；而宁古塔副都统容山则认定东靖民是日本探子东次郎。为什么容山会认定东靖民是东次郎？这主要因为姚文栋情报中提到曾根俊虎、町田实一、清水元一郎、东次郎四名日本探子潜往吉林“窥探吴京卿营中虚实”。这里的“吴京卿”指的是吴大澂。1880年，吴大澂奉旨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琿春等东陲边务。根据其年谱记载，1882年3月23日，吴大澂抵达宁古塔城，“此后常驻塔城，以督屯防”。^③所以姚文栋所说的“吴京卿营中虚实”，也主要是指宁古塔地区的状况。此外，东靖民剃发改装，并擅自记录中国城池、公所、官兵数目以及地名、里数、山川形势等事实，与姚文栋描述的基本一致。所以容山在审讯时，很自然地将东靖民同姚文栋情报中的东次郎联系起来。其实在1884年6月25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安藤太郎致外务卿井上馨的机密信中便提到东靖民的真实姓名是仓辻靖二郎，是陆军省派出执行任务的人员。^④在12月10日安藤太郎致井上馨汇报东靖民案审理情

①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三），第266頁。

② 《咨報日本東靖民一案已照該國例斷罰趙二已遞解回籍由》，光緒十一年七月，總理衙門檔案，01—34—012—03—008，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③ 顧廷龍：《吳憲齋先生年譜》，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5年，第95頁。

④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查一件》（一），第21頁。

况的另一封机密信中再次提到东靖民的真实姓名为仓辻靖二郎。^① 根据这一线索，笔者查阅了为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有功人员”作传的《对支回顾录》和《东亚先觉志士纪传》。然而，在两书中找到了日本陆军工兵大佐仓辻明俊的传，并没有找到仓辻靖二郎的传。那么，两书中记载的仓辻明俊是否就是安藤太郎提到的化名为东靖民的仓辻靖二郎？以下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姓名来分析。根据《对支回顾录》记载，仓辻明俊初名靖次郎，后更名为明俊。在日语中，二郎和次郎为同一单词的两种写法，都读“じろう”。^② 用在人名时，都表示一家的次子。因此仓辻靖二郎与仓辻靖次郎在读音和含义上都是相同的。那么仓辻靖二郎（仓辻靖次郎）又是什么时候改名为仓辻明俊的呢？这在两书中都没有记载。而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陆军省大日记》中则保存了军官改名、改籍等详细的资料。1888年5月8日的一份档案记载陆军工兵中尉仓辻靖次郎申请更名为“明俊”。^③ 由此可知，仓辻明俊只是仓辻靖二郎（仓辻靖次郎）后改的名字。

其次，从其在中国的被捕经历来判断。《东亚先觉志士纪传》和《对支回顾录》两书关于仓辻明俊的传记中也有其在吉林宁古塔被清政府官吏抓获的明确记载。《东亚先觉志士纪传》记载得比较简略，只记载他深入中国东北进行调查，经由吉林到达宁古塔，在那里被清政府逮捕，后在日本方面的交涉下被释放。书中评价其为“我邦人最早深入满洲腹地者”。^④ 而《对支回顾录》开篇就指出“我陆军之满洲调查以1871年池上四郎少佐为开端，继之以1878年岛弘毅中尉，其后1883年仓辻中尉达到了更大的范围。特别是仓辻中尉被支那官吏以军事侦察嫌疑逮捕，投入监狱达数月之久，甚至成为两国之间的外交问题。与前两者相比更富传奇性经历。”具体被捕经过主要介绍了他以营口为起点经由吉林到达宁古塔进行调查，后因同行的中国仆人告密，被当地的官吏逮捕。被捕的原因估计可能是由于在路上绘制地图并派仆人窥探马队的情况。被捕后在营口代理领事英国人班迪诺和北京的驻华公使榎本武扬的斡旋下，最终被释放。^⑤ 《对支回顾录》中记载的在宁古塔案发的经过与外务省的档案不符，另外所记载的被投入监狱达数月之久也是夸大其词。虽然在案件的具体细节上与档案的记载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判断为同一事件。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确定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的化名为东靖民的仓辻靖二郎与《对支回顾录》、《东亚先觉志士纪传》记载的仓辻明俊为同一人。

《对支回顾录》、《东亚先觉志士纪传》的记载都表明他是受参谋本部委派，来中国执行侦察任务的军事人员。

仓辻明俊，伊豫大洲藩士仓辻明则之次子，1854年出生，初名靖次郎，后改名明俊。1871年入陆军幼年学校，1875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879年毕业后任陆军少尉，翌年成为熊本镇台工兵第三大队的小队长。1882年升为工兵中尉，同年调任参谋本部，并奉命到中国执行任

① 《在牛莊帝國陸軍將校東靖民清國內地踏査一件》（三），第215頁。

② 梅棹忠夫等監修：《日本語大辭典》，東京：講談社，1995年，第1088頁。

③ 《井上工兵少尉外改名及転籍等の件》，明治21年5月8日，亚洲歴史資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Ref: C06080488600。

④ 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紀伝》下卷，東京：黒龍会出版部，1936年，第439頁。

⑤ 对支功勞者伝記編撰会：《对支回顧録》下卷，東京：对支功勞者伝記編撰会，1936年，第307—308頁。

务。其后前往中国东北地区，以岛弘毅的《满洲纪行》为参考，以营口为据点，展开侦察活动。^①在宁古塔被清政府地方官抓获。

仓辻在日方的交涉下被释放后，于1885年奉命回国，7月回到东京，12月任职于工兵第二大队。1888年代理士官学校教官，1892年复归参谋本部，后又奉命前往朝鲜。在朝鲜期间的主要使命是研究朝鲜的兵要地理，对朝鲜内地进行军事侦察。1893年起，仓辻明俊带领两名随从由京城出发，入开城，至平壤，经顺安、定州一直到鸭绿江边的义州，然后渡过鸭绿江到中国境内的安东县，在调查完九连城后重返朝鲜的义州。又从义州沿江北上，经由昌城、渭原、满浦等地再次潜入中国境内，一直到盛京通化县的洞沟，^②看过好太王碑后返回朝鲜。后又沿图们江东下，对中朝两国的边境线进行侦察，然后由庆兴南下，他的侦察活动几乎踏遍了朝鲜八道，花费二百余日，其军事侦察的成果对后来的中日战争“大有贡献”。^③

甲午战争爆发后，已晋升为工兵少佐的仓辻明俊随第一军司令部转战辽东。1895年4月回国，依功被授予功四级金鷄勋章及单光旭日章。1899年1月被增补为参谋本部部员，10月晋升工兵中佐。1900年8月担任工兵第四大队长，仍兼任参谋本部御用挂。后日俄战争爆发，任“满洲”军政委员并随第一军司令部出征辽东。1905年7月转任辽东第一兵站司令官。1906年3月回国，被授予旭日中绶章，5月晋升为工兵大佐。1917年退役，同年10月28日病死。^④

此外，《陆军省大日记》中保存的一份1882年9月19日由仓辻靖二郎提交给参谋本部申请在前往中国出差后薪俸转交给其指定人员的报告，^⑤也显示他是受参谋本部委派来中国的。那么，仓辻靖二郎被派到中国到底执行什么样的侦察任务呢？《陆军省大日记》中另一份1886年12月2日由仓辻靖二郎向参谋本部提交的汇报丢失器材情况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携带式制图器一个，内有分度规一个、十公分规尺一个、两脚规一个、铅笔托一个。

此外还有二十公分规尺一个。以上为此前在清国驻扎期间之借用品，于明治十六年在牛庄寓所制图期间丢失。另有，带游标罗盘一个，但皮囊未丢失，此亦为此前驻扎清国期间之借用品，然于明治十七年旅行之际在宁古塔东部抬马沟地区因雪中翻车而丢失。^⑥

在报告中仓辻靖二郎明确汇报了携带式制图器、规尺等工具是在牛庄寓所制图时丢失的，而罗盘是在宁古塔地区丢失的。这也表明他的任务是绘制地图，其侦察的范围达到了宁古塔地区。近年来，日本学界的一些新发现，也为了解仓辻靖二郎及其他日本军官的侦察活动提供了实物证据。2008年3月，日本学者小林茂、山近久美子、渡边理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了一批由日本军官绘制的中国、朝鲜地图。其总数在150幅以上，从能够判明的年代情况来看，基

① 东靖民案虽然发生在光绪十年，实际上从光绪九年开始，仓辻明俊就以营口为据点，以领照游历为掩护，对辽东地区展开了侦察活动。这在中国的史料中也能找到相关线索。如负责旅顺军港修建的袁保龄在光绪九年九月二十九日（1883年10月29日）的一份报告中称“九月十一日（10月11日）有日本人东靖民、木村九郎二名由营口陆行至旅，执领事班迪诺发给游历护照，盖有山海关道印信，即日赴各处观览后，次日赴金州”。详见袁保龄：《阁学公集》公牍卷2，宣统三年清芬阁编刊，第40页a。

② 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境内。

③ 对支功勞者伝記編撰会：《对支回顧録》下卷，第309頁。

④ 对支功勞者伝記編撰会：《对支回顧録》下卷，第308頁。

⑤ 《清国に差遣しに付き宅料下渡の件》，明治15年9月19日，亚洲歴史資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Ref: C07080842600。

⑥ 《参貞第930号第1》，明治19年12月2日—明治20年1月12日，亚洲歴史資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Ref: C07081421600。文中术语的翻译主要参考小林茂、山近久美子、渡边理绘：《初期外邦図の作製過程と特色》一文的相关说明。

本上绘制于 1882 年至 1888 年之间。这批地图多为行军路线图，图上主要绘有道路及沿线的地物，比例尺大多为十万分之一。其中也有绘制城市和地方的中心地区，比例尺为四千分之一至二万分之一的地图。绘制者的军衔多为中尉或大尉，兵种主要有步兵、炮兵、工兵等。^① 山近久美子和渡边理绘详细整理了其中的 39 幅，以表格的形式录入了地图的尺寸、制作年代、比例尺、制作者、地域、图中文字等内容。这些整理的地图中就有工兵中尉仓辻靖二郎绘制的“从营口至宁古塔路上图”。^②

这些地图的发现也证明了化名为东靖民的仓辻靖二郎就是秘密绘制军事地图的间谍。后来他在朝鲜最初侦察的由开城至平壤，经由义州渡过鸭绿江至九连城的线路，正是甲午战争中日本第一军攻入中国东北的线路。

四、小 结

从 1882 年 9 月，驻日公使馆随员姚文栋向清政府提供的有关日本间谍潜入中国内地的情报，到一年以后发生的东靖民案，证明了“窥探吴京卿营中虚实”的日本探子确实存在。被抓获的“日本国土族”东靖民，剃发改装、越境潜游并擅自记录中国城池、公所、官兵数目以及地名、里数、山川形势等，其间谍行为非常明确。敌方的间谍活动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也是对国家主权的破坏。然而，清政府方面却作出一系列妥协，同意由日方行使领事裁判权，单独审理东靖民案，在审理过程中，观审的中国官员也未能对日本的间谍活动进行揭露。

清政府在处理东靖民案时对日本作出一系列妥协，与当时中法战争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1884 年正处于中法战争期间，当时盛传日法联合，对清政府进行夹攻。早在 1883 年 6 月 24 日李鸿章就致电驻日公使黎庶昌询问日本国内的动向，“闻日本有助法攻华之意，确否，望密查电示”，第二天黎庶昌回电“此间近颇安静，看不出有助法意”。^③ 虽然黎庶昌没有发现日法联合的迹象，但清政府方面仍然处于担心日法联合的“阴影”之下，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清政府自然会尽量避免在敏感问题上同日本发生更大的外交纠纷。

根据总理衙门档案的记载，1884 年 8、9 月份正当东靖民案审理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再次发回日本间谍潜入中国的情报，总理衙门很快作出了反应，并致函各地的督抚大员，命令查拿日本间谍，从 10 月 21 日江苏巡抚卫荣光的复函中可知总理衙门所发之命令：“查日本心存覬觐已久，近因法事尤怀叵测，应严密稽查以杜绝窥伺……其有形迹可疑或改装中国服色而无护照者，立即扣留，送交领事官审办，惟不可加以凌虐，免滋口实”。^④由此可见，在中法战争背景下，鉴于日本“因法事尤怀叵测”，清政府方面虽然依据情报努力查拿日本间谍，但在如何处

① 小林茂、山近久美子、渡边理绘：《初期外邦図の作製過程と特色》，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人文地理学教室：《外邦図ニューズレター》，No. 6，2009 年 3 月，第 101 頁。

② 山近久美子、渡边理绘：《アメリカ議会図書館所蔵の日本軍将校による 1880 年代の外邦測量原図》，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人文地理学教室：《外邦図ニューズレター》，No. 6，2009 年 3 月，第 86—87 頁。

③ 《寄黎使》（光绪九年五月二十日）、《附黎使复电》（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21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62 页。

④ 《函复遵查倭人改装易服赴华窥探已密饬照办由》，光绪十年九月，总理衙门档案，01—34—012—03—001，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置方面，还是极力避免与日方发生纠纷，抓到间谍即交给日本领事审理。

在东靖民案成功销案之后，出于战争准备的需要，日本军方扩大了对华侦察的范围，所派遣的间谍潜伏的时间也更长了。如1886年，参谋本部派遣陆军中尉荒尾精在汉口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乐善堂汉口支店。该机构聚集了一大批日本间谍，以经商为掩护，剃发改装潜入中国各地，展开了广泛的情报收集。^①同一年，日本海军也派遣海军中尉关文炳到中国进行军事侦察。关文炳改装成中国商人，在华潜伏长达七年，他在天津城外以开书店为掩护，对华北沿海进行种种侦察活动。^②其后，日本在进行军备扩张的同时，又派遣泷川具和、井上敏夫、出羽重远等人对中国海军及沿海、内河水路进行详细侦察；而同一时期，在东靖民案销案后被释放回国的仓辻明俊也完成了对中朝两国边境线以及日军进军路线的侦察。1893年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又亲自到朝鲜和中国进行侦察，以坚定发动战争的信心。在完成对中国和朝鲜的军事侦察后，日本最终发动了以朝鲜为跳板，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甲午战争。

〔作者陈景彦，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徐磊，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生。
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焦 兵 责任编审：姚玉民）

① 日本间谍组织乐善堂汉口支店在中国的侦察活动详见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紀伝》上卷，東京：黒龍会出版部，1936年，第336—395頁。

② 对支功劳者伝記編撰会：《对支回顧録》下卷，第447—453頁。